

# 关系型全球价值链的就业效应研究\*

岳有福<sup>1,2</sup> 侯俊军<sup>1,2</sup> 叶家柏<sup>3</sup>

(1. 湖南工商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05;  
2.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9;  
3.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4)



**内容提要:** 了解关系型全球价值链(GVC)的就业效应,对于政府实现“稳就业”政策目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此,本文基于企业间溢出—反馈效应模型,通过区分境内GVC和跨境GVC关系,对中国关系型GVC的就业效应进行了测度和分析,并通过结构分解分析方法,探究了关系型GVC视角下中国就业变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8年以后,中国境内GVC就业效应超过跨境GVC就业效应,境内GVC就业效应逐渐成为关系型GVC就业效应的主体。如果仅考虑跨境GVC关系的就业创造,忽略与外资企业相关的境内GVC就业效应,将会造成就业和产业政策的误判。分解结果表明,境内GVC关系效应和本国最终产品需求效应是中国实现“稳就业”的关键。跨期对比发现,境内GVC关系效应对中国就业增长的影响在加大。这当中,内外资企业间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发挥了重要作用。行业分解表明,境内GVC关系效应促使中国就业增长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且以批发零售贸易业和其他商务服务业两个行业最为明显。

**关键词:** 关系型全球价值链 溢出反馈模型 境内全球价值链就业 结构分解 就业增长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25)04—0061—19

## 一、引言

就业承载着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人民通过勤劳致富实现自身发展和美好生活向往的基本途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凭借劳动力禀赋和低成本优势,中国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 GVC)分工和贸易体系,实现了就业的大幅增长(张志明等,2016<sup>[1]</sup>;李磊等,2017<sup>[2]</sup>;赵玉焕等,2019<sup>[3]</sup>)。然而,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地缘政治冲突和大国竞争等诸多压力下,贸易、投资方式加速调整,原有的全球价值链关系被重构,对中国就业产生了深远影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研究全球价值链的关系特征(Antràs和Chor,2022)<sup>[4]</sup>,对中国当前实现“稳就业”政策目标和加快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不同于传统贸易方式中匿名的一次性交易,GVC是一种关联性交易,这种交易往往发生在企业内部或者跨企业边界(Antràs,2020)<sup>[5]</sup>,它强调了企业的作用。由于存在“沉没成本”或者信

收稿日期:2024-01-26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标准治理与全球贸易规则重构研究”(17ZD09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形成机制、影响因素与减排政策优化研究”(72174059);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与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研究”(23ZDAJ004)。

作者简介:岳有福,男,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是投入产出分析与经济统计,电子邮箱:yofuyue@126.com;侯俊军,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是标准化、全球贸易规则与全球价值链,电子邮箱:eshoujunjun@163.com;叶家柏,男,研究助理,研究领域是投入产出分析与经济统计,电子邮箱:yejiabai@126.com。通讯作者:叶家柏。

息鸿沟的障碍,企业寻找可替代的市场和构建新的关系网络所引致的成本远远高于维持现有关系的成本(Allen,2014)<sup>[6]</sup>。在此情形下,依据技术、成本等优势参与GVC生产环节的企业与供应链上下游的企业之间产生了频繁的互动,以维持一种稳定的契约关系。这种企业间的互动体现了至少两个国家的增加值,它可能发生在不同国家企业间,也可能发生在一国内部跨国企业子公司(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间(祝坤福等,2022)<sup>[7]</sup>。随着企业在全球任何可能的地方寻求效率,提供资本、技术、劳动等生产要素的企业均可参与到GVC生产网络中,这些企业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反复互动,使GVC关系变得具有“黏性”(Antràs和Chor,2022)<sup>[4]</sup>。正如Antràs(2020)<sup>[5]</sup>指出的那样,GVC活动本质上是关系型的,其涉及的原材料和同质中间投入的交易更可能表现出持久性或黏性,需要企业间的多次重复互动,而不仅仅是一次互动,因此被称为关系型GVC活动。

有关GVC就业核算的研究建立在对贸易总值的分解(Koopman等,2014<sup>[8]</sup>;王直等,2015<sup>[9]</sup>)和对GDP生产活动分解(Xiao等,2020<sup>[10]</sup>;Wang等,2022<sup>[11]</sup>)的基础上。虽然该研究增进了对GVC时代贸易对就业影响的理解,但却没有关注到关系型GVC活动的就业创造效应,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关系型GVC核算进展缓慢(祝坤福等,2022)<sup>[7]</sup>。关系型GVC的核算需要企业间的联系数据(Antràs,2020)<sup>[5]</sup>,尤其是一国内部由境外资本有序流入的跨国企业子公司(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间的互动联系,而这在现有海关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是极难获得的。但是,依据跨国企业活动(Activiti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MNE)数据库提供的区分内外资企业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Inter-Country Input-Output, ICIO)(Cadestin等,2018)<sup>[12]</sup>,进行关系型GVC就业效应的核算成为可能。AMNE-ICIO表能够描述全球企业间的生产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基于企业间的溢出一反馈效应模型(Miller和Blair,2009)<sup>[13]</sup>,可以刻画全球价值链的关系性质。

与区域间经济联系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相似,一国参与GVC的企业间互动关系对一国经济体系的总体表现也至关重要。由于准确刻画了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溢出一反馈效应模型成为研究区域间经济关联的有效工具。研究人员经常使用溢出一反馈效应模型研究区域间经济的相互关联性(张友国,2017<sup>[14]</sup>;刘瑞翔等,2017<sup>[15]</sup>),部分文献关注了国家间溢出反馈对就业的影响(谢锐等,2020<sup>[16]</sup>;Wang等,2024<sup>[17]</sup>)。区域间的经济发展需要劳动力投入,因此区域间的经济互动会导致就业的溢出和反馈。实际上,投入产出框架下,溢出一反馈效应模型本质上是通过中间产品提供、使用发生的生产联系,而生产分散化和投资全球化背景下,中间产品在一国内部和国内外不同企业间进行循环互动已成为常态(侯俊军等,2023)<sup>[18]</sup>,这启发了本文将异质性企业间互动关系纳入溢出一反馈效应模型来刻画GVC的关系性质,从而使关系型GVC就业效应的核算成为可能。

鉴于此,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基于企业间溢出一反馈效应模型,构建了一个关系型GVC就业效应的分析框架,对中国关系型GVC的就业效应进行了测度和分析,并通过结构分解分析(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SDA)方法,探究了关系型GVC视角下中国就业变动的影响因素。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和价值主要有三点:第一,进行了识别和衡量关系型GVC就业效应的尝试。全球价值链是企业层面的一个微观现象,尽管宏观和行业层面的数据可以描述中国或行业参与GVC的就业效应,但却没有关注到具体参与GVC企业的就业创造,尤其是以企业间互动关系为核心的关系型GVC就业,因而未能给出当前GVC背景下中国就业变动的完整图景。本文立足于关系型GVC的内涵,借助于企业间溢出一反馈效应模型,将异质性企业间互动关系纳入就业核算模型,丰富了对GVC背景下中国就业问题的认识。第二,区分了境内GVC就业和跨境GVC就业。尽管全球价值链就业核算的文献增进了对GVC就业效应的理解,但却没有考虑到

发生在一国境内与外资企业相关的境内GVC关系的就业创造(简称境内GVC就业)。现有文献更多聚焦于跨境GVC关系的就业创造(简称跨境GVC就业),而对境内GVC就业缺乏探讨<sup>①</sup>。本文重点考虑了与外资企业相关的境内GVC就业,是传统仅考虑跨境GVC就业核算框架所未涉及的。第三,为理解“稳就业”政策目标实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相比已有中国就业变动结构分解分析的文献(卫瑞和张文城,2015<sup>[19]</sup>;葛阳琴和谢建国,2019<sup>[20]</sup>;谢锐等,2023<sup>[21]</sup>),本文将重点放在不同类型的GVC关系效应上(如外资企业间乘数效应、内外资企业间溢出和反馈效应),这对现有研究是重要补充和拓展。并且,参考侯俊军等(2023)<sup>[18]</sup>的逻辑,通过跨期对比,本文分析了何种因素变动更有助于政府实现“稳就业”的政策目标。

## 二、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

### 1. 关系型GVC就业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

关系型全球价值链活动的理论解释可追溯到全球价值链治理(Gereffi等,2005)<sup>[22]</sup>、参与价值链企业的组织选择(Antràs和Chor,2013)<sup>[23]</sup>以及有关任务贸易和碎片化生产的国际贸易(Grossman和Helpman,2005<sup>[24]</sup>;Timmer等,2019<sup>[25]</sup>)等相关文献。Gereffi等(2005)<sup>[22]</sup>最早提出了“关系型价值链”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五种价值链治理模式的一种<sup>②</sup>。当生产过程需要高水平的投入定制或特定关系投资时,以及当现有供应商具有足够强大的能力来满足买方的生产需求时,这种价值链安排更有可能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买方与其供应商之间的联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立起来”,这种反复的互动往往伴随着隐性知识的交流,这在GVC联系中产生了一种相互依赖,使得转向新伙伴的成本很高(Antràs和Chor,2022)<sup>[4]</sup>。在合同本身不完备的情况下,或者并非所有事项都可以通过合同规定,GVC中买方与供应商的联系往往通过建立一种契约关系(例如信任和声誉)来维持(Baker等,2002)<sup>[26]</sup>。此时,企业间的多次重复互动对于建立声誉十分重要(Epede和Wang,2022)<sup>[27]</sup>,这是在GVC企业间建立持久性或黏性关系的关键。可以发现,关系型GVC以企业间的相互依存和互动关系为核心(Lakhani等,2013)<sup>[28]</sup>。

这种企业间的互动关系可能发生在不同国家企业间,也可能发生在一国内部跨国企业子公司(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间。鉴于此,根据其范围的不同,GVC关系又分为境内GVC关系和跨境GVC关系。由于外资企业是生产要素跨境的结果(Wang等,2021<sup>[29]</sup>;祝坤福等,2022<sup>[7]</sup>),因此,区别于传统基于中间品跨境互动交易形成的跨境GVC关系(即国内外企业间互动关系),发生在东道国境内与外资相关的国内企业间互动关系则被称为境内GVC关系。关系型GVC可以通过学习效应和关联效应对一国就业产生影响。从学习效应看,关系型全球价值链的“黏性”使得企业容易与全球高生产率企业进行反复互动(Antràs,2020)<sup>[5]</sup>,并从中获益,促使企业生产率提高。继而,生产率提高引致的企业产出增加,导致企业劳动力就业的增加(World Bank,2020)<sup>[30]</sup>。作为关系型GVC活动的重要载体,外资企业进入通过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和提高企业生产率,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刘灿雷等,2018<sup>[31]</sup>;毛其淋和方森辉,2020<sup>[32]</sup>)。已有文献证实了外资进入在稳定本土企业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张婷等,2021<sup>[33]</sup>;陈勇兵等,2024<sup>[34]</sup>)。从关联效应看,企业间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企业间上下游产业关联的价值链关系基础上,包括与上游企业建立的后向关联、与下游企业建立的前向关联(包群等,2015)<sup>[35]</sup>。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紧密融合,为跨国企业提供了在中国延伸价值链和利用中国劳动力的绝佳机会。例如,早期中国东南沿海地

<sup>①</sup> 关系型GVC活动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主要行为者(即跨国企业)置于中心地位。根据GVC活动的内涵,发生在东道国境内与外资企业相关的生产活动属于“被忽视”的GVC活动(祝坤福等,2022)<sup>[7]</sup>。境内GVC就业与依托于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的外资企业关联密切,而跨境GVC就业与企业间中间产品的跨境贸易关联密切。

<sup>②</sup> 即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和层级型。

区大量出现的为外资企业进行外向配套的内资企业(金京等,2013)<sup>[36]</sup>。一方面,内资企业通过前后向关联的形式嵌入到外资企业的价值链中(侯俊军等,2023)<sup>[18]</sup>,并日益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外资企业间的竞争压力以及国内市场导向使得外资企业日益依赖内资企业的中间产品投入(许和连等,2007<sup>[37]</sup>;葛顺奇等,2021<sup>[38]</sup>),这种生产活动就业吸纳量大,提供了诸多就业岗位。

这让学者清楚地意识到,在探讨中国就业问题时不能忽视关系型GVC的影响。如何从数量上识别和测度关系型GVC的就业效应及其对中国就业增长的重要性,这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借助纳入企业维度的就业拓展型投入产出分析技术,本文实现了这一目标。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是本文的研究议题所决定的。因为企业间互动关系本身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强内生特征,计量方法尚未给出更好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利用投入产出技术可以将企业间的互动过程与就业创造联系起来,从而度量其对就业的影响。为此,通过就业拓展型投入产出分析技术,本文构建了关系型GVC就业核算模型。进一步,考虑到中国实现“稳就业”的政策目标,需要探讨中国就业变动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尤其是探讨与外资相关的境内GVC关系在中国就业增长中发挥的作用。因此,在关系型GVC就业核算框架基础上,本文利用结构分解分析方法度量关系型GVC视角下中国就业变动的因素。沿着上述分析脉络,本文建立了关系型GVC就业效应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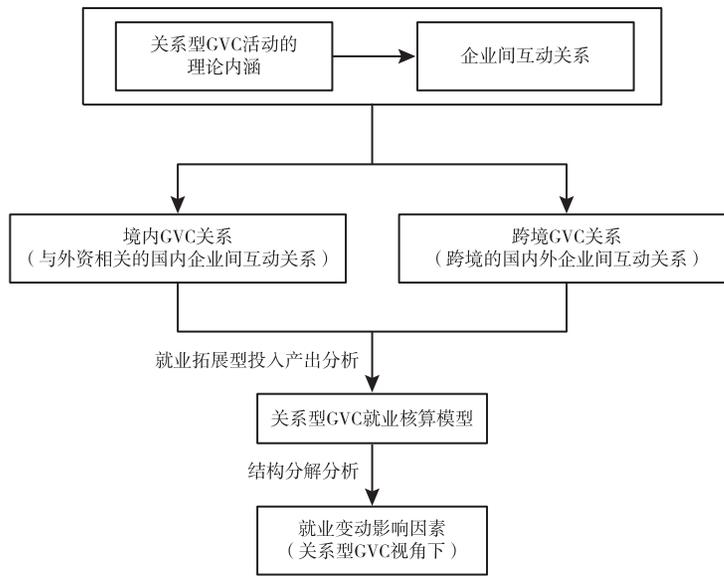


图1 关系型GVC就业效应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 2.关系型GVC就业核算模型

测度关系型GVC就业效应的前提是对全球价值链关系的刻画,本文借助纳入企业维度的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来实现这一目的。表1列示了区分内外资企业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假设全球由G个国家组成,每个国家有N个行业。上标代表一个国家,下标是企业类型。每个行业有两种企业类型,分为内资企业(D)和外资企业(F)。外资企业是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子公司。Z代表企业间的中间产品投入矩阵。以 $Z_{FD}^{sr}$ 为例,其经济含义为r国内资企业使用s国外资企业的中间品。 $Y_D^{sr}$ 和 $Y_F^{sr}$ 分别表示s国内、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作为最终产品被r国直接消费; $Va_D^s$ 和 $Va_F^s$ 分别表示s国内、外资企业增加值向量; $X_D^s$ 和 $X_F^s$ 分别表示s国内、外资企业总产出向量。

表 1 区分内外资企业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

| 投入 \ 产出       |            | 中间需求          |               |               |               |               |               | 最终需求          |            |            |            | 总产出        |         |
|---------------|------------|---------------|---------------|---------------|---------------|---------------|---------------|---------------|------------|------------|------------|------------|---------|
|               |            | 1             | 2             | ...           | G             | 1             | 2             | ...           | G          |            |            |            |         |
| 中间投入          | 1          | $Z_{DD}^{11}$ | $Z_{DF}^{11}$ | $Z_{DD}^{12}$ | $Z_{DF}^{12}$ | ...           | $Z_{DD}^{1g}$ | $Z_{DF}^{1g}$ | $Y_D^{11}$ | $Y_D^{12}$ | ...        | $Y_D^{1g}$ | $X_D^1$ |
|               |            | $Z_{FD}^{11}$ | $Z_{FF}^{11}$ | $Z_{FD}^{12}$ | $Z_{FF}^{12}$ | ...           | $Z_{FD}^{1g}$ | $Z_{FF}^{1g}$ | $Y_F^{11}$ | $Y_F^{12}$ | ...        | $Y_F^{1g}$ | $X_F^1$ |
|               | 2          | $Z_{DD}^{21}$ | $Z_{DF}^{21}$ | $Z_{DD}^{22}$ | $Z_{DF}^{22}$ | ...           | $Z_{DD}^{2g}$ | $Z_{DF}^{2g}$ | $Y_D^{21}$ | $Y_D^{22}$ | ...        | $Y_D^{2g}$ | $X_D^2$ |
|               |            | $Z_{FD}^{21}$ | $Z_{FF}^{21}$ | $Z_{FD}^{22}$ | $Z_{FF}^{22}$ | ...           | $Z_{FD}^{2g}$ | $Z_{FF}^{2g}$ | $Y_F^{21}$ | $Y_F^{22}$ | ...        | $Y_F^{2g}$ | $X_F^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          | $Z_{DD}^{g1}$ | $Z_{DF}^{g1}$ | $Z_{DD}^{g2}$ | $Z_{DF}^{g2}$ | ...           | $Z_{DD}^{gg}$ | $Z_{DF}^{gg}$ | $Y_D^{g1}$ | $Y_D^{g2}$ | ...        | $Y_D^{gg}$ | $X_D^g$ |
| $Z_{FD}^{g1}$ |            | $Z_{FF}^{g1}$ | $Z_{FD}^{g2}$ | $Z_{FF}^{g2}$ | ...           | $Z_{FD}^{gg}$ | $Z_{FF}^{gg}$ | $Y_F^{g1}$    | $Y_F^{g2}$ | ...        | $Y_F^{gg}$ | $X_F^g$    |         |
| 增加值           | $Va_D^1$   | $Va_F^1$      | $Va_D^2$      | $Va_F^2$      | ...           | $Va_D^g$      | $Va_F^g$      |               |            |            |            |            |         |
| 总投入           | $(X_D^1)'$ | $(X_F^1)'$    | $(X_D^2)'$    | $(X_F^2)'$    | ...           | $(X_D^g)'$    | $(X_F^g)'$    |               |            |            |            |            |         |

根据投入产出表的行平衡关系,可以得到: $X = (I - A)^{-1}Y = BY$ 。其中, $A$ 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B$ 为全球里昂·惕夫逆矩阵,反映全球不同国家产业间的经济关联关系。纳入企业维度的里昂·惕夫逆矩阵体现了以中间品交易为媒介的企业间生产互动关系,是刻画关系型GVC的关键。就业分解主要依据是就业系数结合价值链分解进行的。一般地,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可以看成是劳动力参与的结果。在企业间溢出一反馈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参考侯俊军等(2024)<sup>[39]</sup>,本文引入就业系数列向量( $e_i^s = E_i^s / X_i^s$ ),即单位产出的劳动投入向量。结合 $X = BY$ ,得到就业与价值链的关系,即 $E^s = \hat{e}^s X = \hat{e}^s BY$ 。并根据不同企业间的互动关系,将全球里昂·惕夫逆矩阵分解,得到不同企业间互动关系的就业创造<sup>①</sup>:

$$\begin{aligned}
 E^s = & \underbrace{\hat{e}^s \cdot B_1 \cdot Y \cdot \mu}_{T1: \text{内资企业间就业系数}} + \underbrace{\hat{e}^s \cdot B_2 \cdot Y \cdot \mu}_{T2: \text{外资企业间就业系数}} + \underbrace{\hat{e}^s \cdot B_3 \cdot Y \cdot \mu}_{T3: \text{内外资企业间就业溢出}} + \underbrace{\hat{e}^s \cdot B_4 \cdot Y \cdot \mu}_{T4: \text{内外资企业间就业反馈}} \\
 & \underbrace{\hat{e}^s \cdot B_5 \cdot Y \cdot \mu}_{T5: \text{国内外企业间就业溢出}} + \underbrace{\hat{e}^s \cdot B_6 \cdot Y \cdot \mu}_{T6: \text{国内外企业间就业反馈}} \quad (1)
 \end{aligned}$$

境内GVC就业  
跨境GVC就业

其中,  $B_1 = K_{dd}^{SS} = (I - A_{dd}^{SS})^{-1}$ ;  $B_2 = K_{ff}^{SS} = (I - A_{ff}^{SS})^{-1}$ ;  $B_3 = L_{df}^{SS} + L_{fd}^{SS}$ ;  $B_4 = D_{dd}^{SS} + D_{ff}^{SS}$ ;  $B_5 = \sum_i (B_{dd}^{ST} + B_{df}^{ST} + B_{fd}^{ST} + B_{ff}^{ST}), T \neq S$ ;  $B_6 = F_{dd}^{ST} + F_{df}^{ST} + F_{fd}^{ST} + F_{ff}^{ST}$ 。

$$\begin{aligned}
 B^{SS} &= \begin{bmatrix} B_{dd}^{SS} & B_{df}^{SS} \\ B_{fd}^{SS} & B_{ff}^{SS} \end{bmatrix}; L^{SS} = \begin{bmatrix} L_{dd}^{SS} & L_{df}^{SS} \\ L_{fd}^{SS} & L_{ff}^{SS} \end{bmatrix} = \left[ \begin{pmatrix} E & 0 \\ 0 & E \end{pmatrix} - \begin{pmatrix} A_{dd}^{SS} & A_{df}^{SS} \\ A_{fd}^{SS} & A_{ff}^{SS} \end{pmatrix} \right]^{-1} \\
 D^{SS} &= \begin{bmatrix} D_{dd}^{SS} & 0 \\ 0 & D_{ff}^{SS}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L_{dd}^{SS} - K_{dd}^{SS} & 0 \\ 0 & L_{ff}^{SS} - K_{ff}^{SS} \end{bmatrix}; F^{SS} = \begin{bmatrix} B_{dd}^{SS} & B_{df}^{SS} \\ B_{fd}^{SS} & B_{ff}^{SS}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L_{dd}^{SS} & L_{df}^{SS} \\ L_{fd}^{SS} & L_{ff}^{SS} \end{bmatrix}
 \end{aligned}$$

式(1)把一个经济体的总就业分成六项。其中, $T1$ 项为内资企业间就业系数,代表内资企业间互动关系的就业创造,如中国境内的内资企业A与内资企业B在生产互动过程中所创造的就业岗位。 $T2$ 项为外资企业间就业系数,代表外资企业间互动关系的就业创造。 $T3$ 项为内外资企业间就业溢出,代表内外资企业间互动关系的就业创造,如中国境内的本土内资车企使用外资车企的汽车零部件或者外资车企使用内资车企的汽车零部件,用于生产汽车供本国消费者消费所创造的就业岗位。

① 限于篇幅,详细推导过程备索。本模型的核心是将全球里昂·惕夫逆矩阵区分为不同范围的企业间溢出一反馈效应,以刻画不同企业间的互动关系。其中,全球里昂·惕夫逆矩阵可以分为国内企业间乘数效应、国内外企业间溢出效应以及国内外企业间反馈效应。进一步,区分内外资企业异质性,国内企业间乘数效应(即国内里昂·惕夫逆矩阵)又可以分为内资企业间乘数效应、外资企业间乘数效应、内外资企业间溢出效应以及反馈效应。以内外资企业间溢出效应为例,其代表本国内(外)资企业最终产品变动通过内外资企业间的互动关联关系所引致不同企业总产出的变动。

T4项为内外资企业间就业反馈,同样代表内外资企业间互动关系的就业创造,但与溢出效应不同的是,反馈效应刻画的是复杂的生产互动关系,其经济含义代表内(外)资企业的最终产品生产由于内外资企业间的互动关联引致不同企业总产出的变化,再反过来影响自身总产出变化所带动的就业。T5项为国内外企业间就业溢出,刻画的是国内外企业间互动关系的就业创造,如美国企业使用中国企业生产的硬盘,用于生产电脑供本国消费者消费所引致的就业,这里的中国企业既可能是中国境内的内资企业,也可能是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T6项为国内外企业间就业反馈,刻画的是国内外企业间复杂互动关系的就业创造,其经济含义代表本国企业最终产品生产通过国内外企业间的互动关联引致不同国家企业总产出的变化,再反过来影响本国企业总产出变化所带动的就业。

关系型GVC的核心是企业间的相互依存和动态关系(Lakhani等,2013)<sup>[28]</sup>,其关键在于企业间基于中间品交易关系的持久性或黏性。这种黏性关系取决于信任和声誉(Epede和Wang,2022)<sup>[27]</sup>,需要通过参与GVC企业间的多次重复互动才能建立。在上述分解模型中,企业间溢出一反馈模型建立的核心是里昂·惕夫逆矩阵,而纳入企业维度的里昂·惕夫逆矩阵暗含中间产品多次跨越国界或企业边界,因而可以解释跨企业边界和跨国生产背后的企业间多次互动关系,这为刻画GVC关系提供了可能。式(1)中,T1项仅涉及内资企业间的互动关系,与关系型GVC就业无关。T2~T4项与依托于FDI的外资企业关联密切,代表境内与外资企业相关的企业间关系引致就业。由于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子公司是外国生产要素跨越国界的结果(Wang等,2021<sup>[29]</sup>;祝坤福等,2022<sup>[7]</sup>),且这部分关系发生在境内,属于与FDI相关的GVC就业,因而本文将其称为境内GVC就业;T5和T6项不管是外资企业,还是内资企业,均与中间产品的跨境贸易关联密切,度量的是国内外企业间基于中间品的跨境交易所引致就业,本文将其称为跨境GVC就业。境内GVC就业和跨境GVC就业合计为关系型GVC就业。

### 3.关系型GVC视角下中国就业变动的结构分解

为了探究不同类型的关系型GVC对中国就业变动的影响,接下来对中国就业变动进行结构分解分析(SDA)。在进行结构分解时,从不同的因素开始分解会导致不同的分解结果,较好的处理方式是将所有分解结果平均化,即两极分解平均法(Dietzenbacher和Los,1998)<sup>[40]</sup>。因此,本文也采用该方法。假设*t*-1期和*t*期,用下标表示,那么中国就业的变动为:

$$\begin{aligned}\Delta E^s &= E_t^s - E_{t-1}^s = \hat{e}_t^s \cdot B_t^s \cdot Y_t \cdot \mu - \hat{e}_{t-1}^s \cdot B_{t-1}^s \cdot Y_{t-1} \cdot \mu \\ &= C(\Delta \hat{e}^s) + C(\Delta B^s) + C(\Delta Y)\end{aligned}\quad (2)$$

其中, $\Delta \hat{e}^s$ 、 $\Delta B^s$ 和 $\Delta Y$ 分别代表劳动投入强度效应、投入产出结构效应和最终产品需求效应。在此基础上,结合式(1),并根据对不同类型的企业的最终产品需求(侯俊军等,2023)<sup>[18]</sup>,本文将中国就业变动分解为14个因素的影响(如表2所示),具体如下:

$$\begin{aligned}\Delta E^s &= C(\Delta \hat{e}_d^s) + C(\Delta \hat{e}_f^s) + C(\Delta B_1) + C(\Delta B_2) + C(\Delta B_3) + C(\Delta B_4) + C(\Delta B_5) + C(\Delta B_6) \\ &\quad + C(\Delta Y_d^s) + C(\Delta Y_f^s) + C(\Delta Y^{(-s)S}) + C(\Delta Y_d^{-S}) + C(\Delta Y_f^{-S}) + C(\Delta Y^{(-S)(-S)})\end{aligned}\quad (3)$$

表2 关系型GVC视角下中国就业变动的影响因素

| 效应       |           | 影响因素                    | 含义           |
|----------|-----------|-------------------------|--------------|
| 劳动投入强度效应 |           | $C(\Delta \hat{e}_d^s)$ | 内资企业劳动投入强度效应 |
|          |           | $C(\Delta \hat{e}_f^s)$ | 外资企业劳动投入强度效应 |
| 投入产出结构效应 | 内资企业间乘数效应 | $C(\Delta B_1)$         | 内资企业间乘数效应    |
|          | 境内GVC关系效应 | $C(\Delta B_2)$         | 外资企业间乘数效应    |
|          |           | $C(\Delta B_3)$         | 内外资企业间溢出效应   |
|          |           | $C(\Delta B_4)$         | 内外资企业间反馈效应   |
|          | 跨境GVC关系效应 | $C(\Delta B_5)$         | 国内外企业间溢出效应   |
|          |           | $C(\Delta B_6)$         | 国内外企业间反馈效应   |

续表 2

| 效应      |            | 影响因素                     | 含义               |
|---------|------------|--------------------------|------------------|
| 最终品需求效应 | 本国最终产品需求效应 | $C(\Delta Y_d^S)$        | 对本国内资企业最终品需求效应   |
|         |            | $C(\Delta Y_f^S)$        | 对本国外资企业最终品需求效应   |
|         |            | $C(\Delta Y^{(-S)S})$    | 对国外企业最终品需求效应     |
|         | 国外最终产品需求效应 | $C(\Delta Y_d^{-S})$     | 国外对本国内资企业最终品需求效应 |
|         |            | $C(\Delta Y_f^{-S})$     | 国外对本国外资企业最终品需求效应 |
|         |            | $C(\Delta Y^{(-S)(-S)})$ | 国外对国外企业最终品需求效应   |

4.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 AMNE 数据库以及与之配套的就业贸易数据库 (the Trade in Employment Database, TiM)。AMNE 数据库提供了区分内外资企业的投入产出表 (Cadestin 等, 2018)<sup>[12]</sup>, 包括 59 个国家(地区)和 1 个世界其他地区(ROW), 其中每个国家(地区)有 34 个产业部门, 数据年份覆盖 2005—2016 年。各经济体间投入产出表中的每个单元被分解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其中, 内外资企业属性根据控股所有权至少拥有 50% 进行划分。TiM 数据库提供了 1995—2018 年间 45 个产业部门的就业数据和劳动力报酬数据 (Horvát 等, 2020)<sup>[41]</sup>。在数据处理前根据 ISIC 产品编码, 本文将 AMNE 数据库和 TiM 数据库部门进行一一匹配, 最终确定为 34 个部门, 部门构成如表 3 所示。

表 3 部门构成

| 序号  | 部门             | 序号  | 部门                 |
|-----|----------------|-----|--------------------|
| S1  | 农业、林业、渔业       | S18 | 其他制造业, 机械设备的修理和安装业 |
| S2  | 能源产品的开采和提取     | S19 | 电力、燃气、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S3  |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 S20 | 建筑业                |
| S4  | 纺织、服装、皮革及相关制品业 | S21 | 批发零售贸易、汽车修理业       |
| S5  |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 S22 |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           |
| S6  | 造纸印刷及其制品业      | S23 | 住宿和餐饮业             |
| S7  | 焦炭和精炼石油业       | S24 | 出版、视听和广播业          |
| S8  | 化学及医药制品业       | S25 | 电信业                |
| S9  |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 S26 | IT 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      |
| S10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S27 | 金融保险业              |
| S11 | 基本金属业          | S28 | 房地产业               |
| S12 | 金属制品业          | S29 | 其他商务服务业            |
| S13 | 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品业   | S30 | 公共管理和社会保障          |
| S14 | 电气设备业          | S31 | 教育                 |
| S15 | 机械设业           | S32 | 卫生和社会福利业           |
| S16 | 机动车辆、挂车和半挂车业   | S33 | 文化体育娱乐业            |
| S17 | 其他运输设备业        | S34 | 有就业的私人部门           |

TiM 数据库并未对就业进行所有权划分, 因而本文的一个关键就是如何将中国整体的就业分配给内外资企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本文采取了一些假设并对现有数据进行了处理。首先, 假设同一行业内外资企业的单位劳动力工资相等, 用各行业劳动力报酬除以各行业就业量, 得到各行业单位劳动力工资, 这一思路与田开兰等(2018)<sup>[42]</sup>、张俊荣等(2022)<sup>[43]</sup>和侯俊军等(2024)<sup>[39]</sup>对异质性企业就业的处理思路一致。继而,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得到区分内外资企业的劳动报酬。

祝坤福等(2022)<sup>[7]</sup>根据投入产出模型中关于同一国家同一行业生产的同质性假设,假设外资企业的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在增加值中的占比与东道国本土企业一致。在此基础上,本文假设同一行业内外资企业的要素投入结构比相等,即同一行业内外资企业的劳动力报酬与资本收益比相等。其次,根据 AMNE 数据库提供的各行业内外资企业的增加值和上述假设,以各行业劳动力报酬作为控制数,得到各行业区分内外资企业的劳动报酬。最后,将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劳动报酬除以单位劳动力工资就得到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就业量。

### 三、中国关系型 GVC 就业效应分析

#### 1. 中国关系型 GVC 就业效应的总体分析

图 2a 列示了中国就业中不同活动的就业创造。结果显示,关系型 GVC 在吸纳带动中国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5—2016 年,关系型 GVC 就业占中国总就业的比重为 16.21%~18.67%。而内资企业间就业乘数占比为 81.33%~83.79%,是中国就业创造的主要来源。从就业增长率来看(图 2b),相比期初,中国内资企业间就业乘数增长了 3.72%,关系型 GVC 就业下降了 5.29%,总就业增幅为 2.14%。尽管内资企业间就业乘数是中国就业创造的主要来源,但金融危机前内资企业间互动活动引致的就业量却在下降,2005—2007 年中国内资企业间就业乘数下降了 0.55%。而同时期的关系型 GVC 就业却保持了高速增长,相比期初增长了 7.78%。随着加入世贸组织,依靠劳动力竞争优势和巨大的市场潜力,通过鼓励出口和吸引大量 FDI,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主要的制造基地,带动了劳动力资源的大量投入,导致就业的大幅增长(毛日昇,2009<sup>[44]</sup>;韩民春和张丽娜,2014<sup>[4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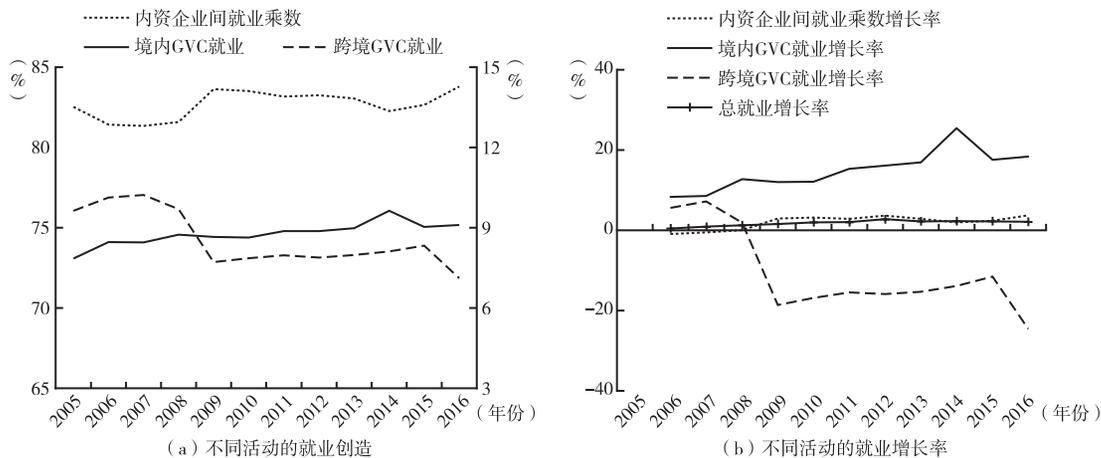


图 2 2005—2016 年中国就业中不同活动的就业创造

注: a 图左轴代表内资企业间乘数引致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右轴代表境内 GVC 和跨境 GVC 就业占总就业比重; b 图纵坐标代表不同类型活动引致就业和中国总就业相对 2005 年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关系型 GVC 就业中,境内 GVC 就业和跨境 GVC 就业呈现不同的阶段特征。2005—2008 年,相比境内 GVC 关系,跨境 GVC 关系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凭借丰裕的劳动要素和政策扶持的双重优势,中国企业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促进了国内就业的大幅增长(谢锐等,2023)<sup>[21]</sup>。然而,2008 年以后,中国境内 GVC 就业超过跨境 GVC 就业,且从趋势上看,境内 GVC 就业占比在上升(+1.25%),跨境 GVC 就业占比在下降(-2.5%),这凸显了境内关系型 GVC 活动在中国就业创造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探究通过国际贸易反映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一国的就业影响十分重要,但由境外资本有序流入的外资企业间互动以及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间的互动也是国际经贸往

来的一种形式(Meng等,2022<sup>[46]</sup>;祝坤福等,2022<sup>[7]</sup>),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也至关重要。2005—2016年,境内GVC就业占中国总就业的比重为7.85%~9.63%,2016年,境内GVC就业为中国创造了6935万人的就业岗位。从增长率变动看(图2b),伴随着外部需求失速以及跨境GVC活动的减少,跨境GVC就业在2009年迅速回落,较2005年下降了18.6%,而境内GVC就业依旧保持较高增速(2009年较2005年增长了12.06%)。与此同时,内资企业就业乘数也在增长(2009年较2005年就业增长了2.94%),两者抵消了跨境GVC就业的急剧萎缩,最终导致当年就业实现了正增长,实现了危机时期“稳就业”的目标。金融危机后,随着全球价值链逐渐呈现区域化和本土化趋势,中国生产转向依赖于国内生产提供的中间品(黄群慧和倪红福,2021)<sup>[47]</sup>,境内GVC就业增速逐年上升,并于2014年达到25.46%的最高点,而跨境GVC就业增长率尽管有所上升,但增速难以恢复至危机前水平。

表4列示了关系型GVC视角下中国就业细项构成及其占比。内资企业间就业乘数对中国实现“稳就业”目标意义重大,不仅因为其是就业的主体,而且也是应对外部需求调整对中国就业冲击的“压舱石”。例如,金融危机期间(2008—2009年)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2014—2016年),内资企业间就业乘数的增长抵消了跨境GVC就业的急剧萎缩,成为稳定并促进国内劳动力就业增加的重要力量。此外,外资企业作为连接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重要载体(侯俊军等,2023)<sup>[18]</sup>,也是中国就业创造的积极贡献者,这种就业创造主要反映在与内资企业间互动关系上。如2016年由于内外资企业间互动所引致的就业溢出和反馈共计5835万人,占中国总就业的7.65%,而同年外资企业间就业乘数仅为1.44%。祝坤福等(2022)<sup>[7]</sup>发现,中国境内与FDI相关的GVC活动中,有三分之二来自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间的生产关联,这种生产关联也对中国就业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进一步发现,在内资企业间就业乘数比重下降的时间段(2005—2007年和2009—2014年),不同类型境内GVC关系引致就业占比均保持上升趋势(表4)。例如,内外资企业间就业溢出占比在2005—2007年和2009—2014年分别上升了0.26和0.56个百分点,内外资企业间就业反馈这一数值分别为0.12%和0.08%。这可能是因为,相比内资企业间互动关系,以内外资企业间互动关系为主导的境内GVC联系关系更具有“黏性”。这一现象与外资企业在东道国的生产采购策略相关,Antràs等(2017)<sup>[48]</sup>突出了企业在跨市场采购决策中相互依存性的重要性。这种相互依存性往往难以形成且成本高昂,更多基于企业间的隐性契约(例如信任和声誉),需要企业间多次互动来建立(Epede和Wang,2022)<sup>[27]</sup>。而内资企业由于具备本土优势,用新的供应商替代现有供应商的成本较低(侯俊军等,2024)<sup>[39]</sup>。进一步,相比外资企业间就业乘数和内外资企业间就业溢出的频繁波动,内外资企业间就业反馈在2005—2009年和2010—2016年始终保持明显的上升趋势。内外资企业间就业反馈度量的是企业间复杂的经济互动所引致就业,这说明其对中国就业波动的韧性更大。

表4 关系型GVC视角下中国就业细项构成及其占比 (百万人、%)

| 年份   | T1                | T2              | T3              | T4              | T5               | T6             | 总就业             |
|------|-------------------|-----------------|-----------------|-----------------|------------------|----------------|-----------------|
| 2005 | 615.99<br>(82.52) | 10.85<br>(1.45) | 32.46<br>(4.35) | 15.29<br>(2.05) | 70.52<br>(9.45)  | 1.37<br>(0.18) | 746.47<br>(100) |
| 2006 | 610.42<br>(81.41) | 12.16<br>(1.62) | 35.45<br>(4.73) | 15.84<br>(2.11) | 74.32<br>(9.91)  | 1.59<br>(0.21) | 749.78<br>(100) |
| 2007 | 612.57<br>(81.33) | 12.55<br>(1.67) | 34.73<br>(4.61) | 16.32<br>(2.17) | 75.29<br>(10.00) | 1.75<br>(0.23) | 753.21<br>(100) |
| 2008 | 616.36<br>(81.57) | 13.24<br>(1.75) | 35.84<br>(4.74) | 16.98<br>(2.25) | 71.52<br>(9.47)  | 1.70<br>(0.22) | 755.64<br>(100) |

续表 4

| 年份   | T1                | T2              | T3              | T4              | T5              | T6             | 总就业             |
|------|-------------------|-----------------|-----------------|-----------------|-----------------|----------------|-----------------|
| 2009 | 634.10<br>(83.62) | 12.40<br>(1.64) | 34.52<br>(4.55) | 18.74<br>(2.47) | 57.10<br>(7.53) | 1.42<br>(0.19) | 758.28<br>(100) |
| 2010 | 635.57<br>(83.51) | 14.90<br>(1.96) | 35.05<br>(4.61) | 15.72<br>(2.07) | 58.32<br>(7.66) | 1.48<br>(0.19) | 761.05<br>(100) |
| 2011 | 633.65<br>(83.16) | 15.12<br>(1.98) | 36.20<br>(4.75) | 16.25<br>(2.13) | 58.96<br>(7.74) | 1.79<br>(0.23) | 761.96<br>(100) |
| 2012 | 638.54<br>(83.25) | 14.58<br>(1.90) | 35.98<br>(4.69) | 17.47<br>(2.28) | 58.55<br>(7.63) | 1.92<br>(0.25) | 767.04<br>(100) |
| 2013 | 633.62<br>(83.04) | 14.13<br>(1.85) | 36.36<br>(4.77) | 18.00<br>(2.36) | 58.82<br>(7.71) | 2.08<br>(0.27) | 763.01<br>(100) |
| 2014 | 628.05<br>(82.26) | 15.04<br>(1.97) | 39.01<br>(5.11) | 19.46<br>(2.55) | 59.70<br>(7.82) | 2.23<br>(0.29) | 763.49<br>(100) |
| 2015 | 630.74<br>(82.64) | 11.12<br>(1.46) | 36.58<br>(4.79) | 21.17<br>(2.77) | 61.27<br>(8.03) | 2.32<br>(0.30) | 763.20<br>(100) |
| 2016 | 638.87<br>(83.79) | 11.00<br>(1.44) | 36.70<br>(4.81) | 21.65<br>(2.84) | 52.37<br>(6.87) | 1.86<br>(0.24) | 762.45<br>(100) |

注: T1为内资企业间就业乘数, T2为外资企业间就业乘数, T3为内外资企业间就业溢出, T4为内外资企业间就业反馈, T5为国内外企业间就业溢出, T6为国内外企业间就业反馈, 下同; 表中数值表示各项引致的就业量, 单位为百万人, 括号内数值为各项引致就业占中国总就业量的比重, 单位为%

## 2. 中国关系型 GVC 就业效应的行业分析

分大类部门看, 内资企业间就业乘数是各行业就业的主要来源(表 5), 特别是农业和服务业。2016年, 由于内资企业间的互动关联, 农业和服务业分别吸纳了对应行业 88.56% 和 86.46% 的就业岗位。对于关系型 GVC, 已经成为各行业就业创造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尤其是在制造业和服务业。2016年, 关系型 GVC 创造的就业岗位占制造业就业的 30.02%, 占服务业就业的 13.54%。但从绝对量上看, 关系型 GVC 在服务业的就业创造高于制造业。2016年, 关系型 GVC 为服务业带来了 5429 万人的就业岗位, 为制造业带来了 4234 万人的就业岗位。不同类型关系型 GVC 就业中, 制造业境内 GVC 就业小于跨境 GVC 就业, 而服务业境内 GVC 就业高于跨境 GVC 就业。且对比发现, 境内 GVC 活动引致服务业就业高于制造业, 这凸显了境内 GVC 活动在服务业就业创造中的重要作用。境内 GVC 活动与跨国企业在东道国设立的子公司密切相关, 许多跨国企业通过外国分支机构在东道国提供服务<sup>①</sup>, 进而创造了更多就业岗位。对于中国而言, 服务业已取代农业和制造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部门。2016年, 服务业就业占中国总就业的比重为 52.58%。其中, 境内 GVC 活动引致服务业就业占服务业整体就业的比重虽然仅为 8.36%, 但却为中国提供了 3353 万人的就业岗位(占服务业关系型 GVC 就业的 61.76%), 远高于跨境 GVC 活动的就业创造(2076 万人, 占服务业关系型 GVC 就业的 38.24%)。现有文献更多地关注跨境 GVC 关系的就业创造, 而对境内这一“被忽视”的 GVC 活动的就业效应缺乏探讨(Wang 等, 2021<sup>[29]</sup>; 祝坤福等, 2022<sup>[7]</sup>)。以上结果表明, 在考虑关系型 GVC 活动在我国就业创造中的作用时, 如果仅考虑跨境 GVC 活动, 忽略跨国企业子公司在中国境内开展的价值链分工合作(即境内 GVC 活动),

<sup>①</sup> WTO 成员通过在任何其他成员领土内的商业存在提供服务(Meng 等, 2022)<sup>[46]</sup>。例如, 该服务由在 A 国设立的外资企业和外资控股公司的当地附属公司、子公司或代表处提供(如银行、酒店集团或建筑公司)。

那么 61.76% 的关系型 GVC 活动在服务业中的就业创造会被忽略,这将造成就业政策尤其是涉及价值链服务业的就业政策的误判。

表 5 2016年不同生产活动引致大类部门就业及其占比 (百万人、%)

| 大类部门 | 内资企业间就业乘数 (T1)    | 境内 GVC 就业 (T2~T4) | 跨境 GVC 就业 (T5~T6) | 关系型 GVC 就业 (T2~T6) | 合计 (T1~T6)      |
|------|-------------------|-------------------|-------------------|--------------------|-----------------|
| 农业   | 185.17<br>(88.56) | 13.66<br>(6.53)   | 10.25<br>(4.90)   | 23.91<br>(11.44)   | 209.08<br>(100) |
| 采矿业  | 8.42<br>(73.50)   | 1.41<br>(12.34)   | 1.62<br>(14.16)   | 3.04<br>(26.50)    | 11.46<br>(100)  |
| 制造业  | 98.69<br>(69.98)  | 20.75<br>(14.71)  | 21.59<br>(15.31)  | 42.34<br>(30.02)   | 141.03<br>(100) |
| 服务业  | 346.59<br>(86.46) | 33.53<br>(8.36)   | 20.76<br>(5.18)   | 54.29<br>(13.54)   | 400.88<br>(100) |

注:根据 OECD 的划分标准, S3~S18 为制造业, S19~S34 为服务业。表中数值表示不同生产活动引致的就业量,单位为百万人,括号内数值为不同生产活动引致各部门就业占总对应部门就业的比重,单位为%

细分部门层面(如图 3 所示),中国作为制造业 GVC 的网络中心国(Xiao 等, 2020)<sup>[10]</sup>,尽管制造业整体境内 GVC 就业小于跨境 GVC 就业(表 5),但不同行业却呈现异质性。以“纺织、服装、皮革及相关制品业”(S4)和“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品业”(S13)为代表的八个行业境内 GVC 就业占比小于跨境 GVC 就业占比,而以“机动车辆、拖车和半拖车业”(S16)和“其他运输设备业”(S17)等八个行业为代表的境内 GVC 就业占比大于跨境 GVC 就业。其中,“机动车辆、拖车和半拖车业”(S16)境内 GVC 就业是跨境 GVC 就业的六倍,中国汽车产业利用外资的成熟以及国内市场旺盛的汽车需求导致了境内 GVC 活动的活跃,从而引发了更多的就业创造。对于服务业,境内 GVC 就业大于跨境 GVC 就业这一特征不仅体现在服务业整体,也体现在服务业各细分行业中。2016 年,所有服务业细分行业境内 GVC 就业大于跨境 GVC 就业。其中,“出版、视听和广播业”(S24)以及“其他商务服务业”(S29)这两个行业尤为明显。2016 年,境内 GVC 关系在这两个行业引致就业分别是对应行业跨境 GVC 就业的 4.83 倍和 2.52 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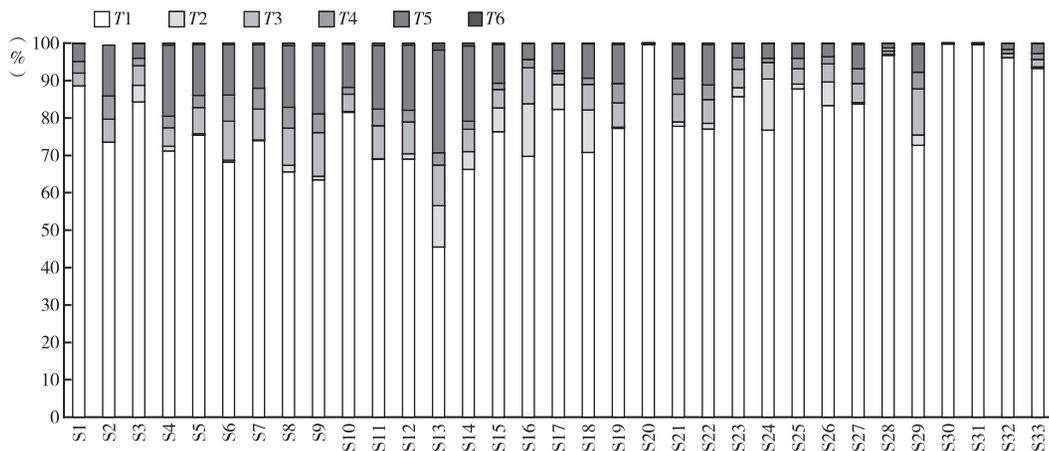


图 3 2016年中国分行业就业细项构成占比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更细项的就业构成来看,部分行业与外资企业相关的就业创造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图 3 所示,“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品业”(S13)、“机动车辆、拖车和半拖车业”(S16)、“其他制造业、机械设

备的修理和安装业”(S18)以及“出版、视听和广播业”(S24)外资企业间就业的乘数效应占对应行业的就业比重均在10%以上。但整体来讲,各行业与外资企业相关的就业创造更多地反映在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互动上,例如“纸制品和印刷业”(S6)、“橡胶和塑料制品”(S9)以及“其他商务服务业”(S29)这三个行业中内外资企业就业溢出和反馈效应合计分别占对应行业就业比重为17.43%、16.69%和16.77%。内外资企业间互动中,各行业呈现内外资企业间就业溢出高于就业反馈效应的特征。其中,制造业中的“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品业”(S13)、“机动车辆、拖车和半拖车业”(S16)以及服务业中的“其他商务服务业”(S29)就业溢出与就业反馈效应的差距明显,均在7%以上。从跨境GVC就业两个细项看,各行业就业创造主要集中在国内外企业间就业溢出上,而国内外企业间就业反馈占比很小。

#### 四、关系型GVC视角下中国就业变动的结构分解分析

如前所述,2008年、2009年和2012年是中国就业变动的关键节点。众所周知,2008年爆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后中国境内GVC就业首次超过跨境GVC就业,而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趋势逐渐显著(张鹏等,2019)<sup>[49]</sup>,且当年中国就业总量开始由增转降。因此,综合考虑中国就业变动特征和不同特殊节点关系型GVC就业的差异,本文以2008年、2009年和2012年的年度数据为基准,将结构分解分析划分为2005—2008年、2008—2009年、2009—2012年、2012—2016年以及2005—2016年共五个时间段。

##### 1. 中国就业变动的结构分解分析

表6中将中国就业变动的14个因素进一步归类为劳动投入强度效应、内资企业间乘数效应、关系型GVC效应和最终产品需求效应。整体来看,劳动投入强度效应为负,内资企业间乘数效应、关系型GVC效应和最终产品需求效应为正。劳动投入强度效应为负与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sup>①</sup>有关,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背景下劳动力重新配置的结果(蔡昉,2017)<sup>[50]</sup>。由上文行业分析可知,样本期内,中国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转移,优化了劳动资源配置效率,成为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原因。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对劳动力需求形成了替代效应,从而抑制了就业增长。研究期间,劳动投入强度效应促使中国就业下降了243.62%。分阶段来看,劳动投入强度效应对就业增长的负向影响在逐渐减弱,如2005—2008年、2009—2012年和2012—2016年这三个时期,劳动投入强度效应分别为-72.42%、-55.03%和-35.32%。这表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在下降。

如表6所示,内资企业间乘数效应、关系型GVC效应和最终产品需求效应三者抵消了劳动投入强度效应对中国就业增长的负向影响,共同促进了中国的就业增长,最终造成2005—2016年中国就业增长了2.14%。其中,作为促进中国就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最终产品需求的扩张抵消了劳动投入强度效应85.02%的负向影响,导致中国就业在2005—2016年增长了207.13%。分阶段来看,最终产品需求效应在金融危机期间对中国就业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中国就业在2008—2009年增长了8.9%。金融危机后,最终产品需求效应进一步发力,但2012年后面临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减速,最终需求效应作用乏力。2012—2016年,最终产品需求效应仅使当期中国就业增长23.91%,不及2009—2012年增速(51.75%)的一半。最终产品需求效应中,本国最终产品需求效应在各时期占最终产品需求效应的比重始终保持在87.45%以上,尤其是在2008—2009年和2012—2016年,更是达到119%和101.81%。无论是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2009年)还是经

<sup>①</sup> 劳动生产率是劳动投入强度的倒数,即单位劳动投入所带来的产出。尽管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一定程度抑制了中国就业规模的扩张,但符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

济增长结构性减速导致的就业总量下降(2012—2016年),本国最终产品需求效应均促进了中国就业的增长。面对外需不振、贸易增速放缓,国外最终产品需求对中国就业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而国内最终品需求效应保证了就业增长的“基本盘”,内需成为拉动我国就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葛阳琴和谢建国,2019)<sup>[20]</sup>。

表6 关系型GVC效应对中国就业变动的影响 单位:%

| GVC效应      | 2005—2008年 | 2008—2009年 | 2009—2012年 | 2012—2016年 | 2005—2016年 |
|------------|------------|------------|------------|------------|------------|
| 劳动投入强度效应   | -72.42     | -7.25      | -55.03     | -35.32     | -243.62    |
| 内资企业间乘数效应  | 1.91       | -0.83      | 1.55       | 7.79       | 23.06      |
| 关系型GVC效应   | 4.51       | -0.47      | 2.89       | 3.03       | 15.58      |
| 境内GVC关系效应  | 0.58       | 0.16       | 0.08       | 1.48       | 4.91       |
| 跨境GVC关系效应  | 3.93       | -0.63      | 2.81       | 1.55       | 10.67      |
| 最终产品需求效应   | 67.22      | 8.90       | 51.75      | 23.91      | 207.13     |
| 本国最终产品需求效应 | 58.79      | 10.59      | 45.30      | 24.34      | 193.61     |
| 国外最终产品需求效应 | 8.43       | -1.69      | 6.44       | -0.43      | 13.52      |
| 总变动        | 1.23       | 0.35       | 1.16       | -0.60      | 2.14       |

注:表中的百分比指各因素在某时期引起的就业增量占期初就业量的比重,下同

投入产出结构效应<sup>①</sup>中,内资企业间乘数效应是投入产出结构效应得以发挥的重要因素,其次是关系型GVC效应。研究期间,两者分别促使中国就业增长了23.06%和15.58%。内资企业间乘数效应和关系型GVC效应度量的企业间中间产品互动的结构变化,本身调整有限,因此,不会表现出像最终产品需求及劳动投入强度那样显著的变化。分阶段看,以金融危机为转折点,内资企业间乘数效应和关系型GVC效应对中国就业增长的影响在增大。特别是在2012—2016年,面临着最终需求效应增长乏力,内资企业间乘数效应和关系型GVC效应两者合计促使中国就业增长了10.81%,提供了8294万个就业岗位,而2009—2012年这一数值仅为4.44%和3367万个。关系型GVC中,相比境内GVC关系效应,跨境GVC关系效应对中国就业增长影响更大。企业积极参与跨境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中国就业规模扩大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但分阶段看,尤其是金融危机后,跨境GVC关系效应对中国就业增长的影响在减弱,而境内GVC关系效应对中国就业增长的影响在加大。如2009—2012年和2012—2016年,境内GVC关系效应促使当期就业增长率分别为0.08%和1.48%,跨境GVC关系效应分别为2.81%和1.55%。前文对于关系GVC就业的构成分解结果显示,2008年以后,中国境内GVC就业超过跨境GVC就业,而且从趋势上看,境内GVC就业占比在上升,跨境GVC就业占比在下降(图2a),而SDA结果进一步表明,境内GVC活动效应在推动中国就业增长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尽管跨境GVC活动效应对我国就业增长十分重要,但与外资企业相关的境内GVC关系效应对我国就业增长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如果不考虑境内GVC关系效应,将会造成对中国就业政策的理解偏差,势必不利于就业优先战略的顺利实施。

## 2. 关系型GVC与中国就业总体变动

作为促进内外循环对接和吸纳就业的重要主体之一,外资企业也对中国就业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内外资企业间互动交流产生的学习效应和上下游产业关联效应对就业产生

① 这里的投入产出结构效应包含内资企业间乘数效应和关系型GVC效应。

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外资企业的最终产品需求满足了多层次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刺激了就业增长。2005—2016年,与外资企业相关的因素变动(内外资企业间溢出效应、反馈效应和国内、国外对外资企业的最终产品需求效应)拉动了92.9百万人的就业,促使中国就业增长了12.45%。其中,与外资企业相关的境内GVC关系效应促使就业增长了4.91%(表7)。此外,国内外企业间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也促进了中国的就业增长,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就业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之一。

表7 2005—2016年关系型GVC与中国就业变动 单位:%

| GVC效应      | 2005—2008年 | 2008—2009年 | 2009—2012年 | 2012—2016年 | 2005—2016年 |
|------------|------------|------------|------------|------------|------------|
| 内资企业间乘数效应  | 1.91       | -0.83      | 1.55       | 7.79       | 23.06      |
| 境内GVC关系效应  | 0.58       | 0.16       | 0.08       | 1.48       | 4.91       |
| 外资企业间乘数效应  | -0.01      | 0.00       | -0.00      | 0.00       | -0.00      |
| 内外资企业间溢出效应 | 0.36       | 0.04       | 0.16       | 0.69       | 2.59       |
| 内外资企业间反馈效应 | 0.24       | 0.12       | -0.07      | 0.78       | 2.32       |
| 跨境GVC关系效应  | 3.93       | -0.63      | 2.81       | 1.55       | 10.67      |
| 国内外企业间溢出效应 | 3.90       | -0.59      | 2.74       | 1.53       | 10.54      |
| 国内外企业间反馈效应 | 0.03       | -0.04      | 0.07       | 0.02       | 0.13       |
| 总变动        | 6.42       | -1.30      | 4.44       | 10.81      | 38.64      |

分阶段来看,各因素变动对中国就业增长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本文将进行跨期对比。研究发现,受外部环境影响,跨境GVC关系效应和内资企业间乘数效应对中国就业增长的影响是不稳定的,2008—2009年两者的影响均为负,而境内GVC关系效应更好地发挥了“稳就业”作用。在整个研究期间及分阶段内,境内GVC关系效应均促使了当期就业的增长(如表7所示)。相比境内GVC活动,跨境GVC活动更易受到政治、汇率、战争等风险的影响(Solingen等,2021)<sup>[51]</sup>,这种影响会破坏全球价值链的黏性关系,由此加大了就业波动。但境内GVC关系是发生在东道国与外资企业相关的企业间多次互动形成的,这种关系受外部冲击影响相对较小,因而更好地保证了就业的平稳增长。需要注意的是,境内GVC关系效应相比内资企业间互动关系效应对就业增长的影响也更为稳定。这可能是因为在危机期间,以内外资企业间密切联系为基础的生产网络结构更依赖于合作伙伴关系的稳定,这种联系也更具有“黏性”,因为供应商改变的成本高昂。而内资企业由于本土优势,改变这种关系的成本相对较低。进一步对比发现,内外资企业间溢出效应均促使了当期中国的就业增长。如果说境内GVC活动效应是促使中国就业平稳增长的关键,那么内外资企业间溢出效应则是发挥“稳就业”作用的重要原因。从趋势上看,金融危机后,境内GVC关系效应尤其是内外资企业间溢出和反馈效应对中国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加大,这其中后者发挥了更大作用。

### 3.关系型GVC与中国分行业就业变动

表8列示了关系型GVC对中国农业、采矿业、制造业、服务业及部分代表性行业就业变动的影响。本文分别以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占比变动最大的前两个行业作为代表性行业,即制造业中的“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品业”(S13)和“机械设业”(S15),以及服务业中的“批发和零售贸易、汽车修理业”(S21)和“其他商务服务业”(S29)。整体来看,劳动投入强度的下降是抑制各行业就业增加的主要因素,最终需求增加是促进各行业劳动力就业增加的关键因素,内资企业间乘数效应

和关系型GVC变化效应是影响各行业就业增长的重要因素,各具体细项对各行业就业变动的影响也大致呈现相似的结论。

2005—2016年,中国境内GVC关系效应促使中国就业增长了3664万人。其中,47.1%来自服务业,30.74%来自农业,22.14%来自制造业,0.02%来自采矿业。这再次凸显了服务业在境内GVC就业创造中的重要性,与前文结论一致。其中,境内GVC关系效应促使服务业就业增长的细分行业主要集中在“批发和零售贸易、汽车修理业”(1276万人)以及“其他商务服务业”(177万人),两者对境内GVC关系效应促进服务业就业增加的贡献度分别为73.93%和10.27%,合计超过80%。纵向对比发现,境内GVC关系效应对各行业就业变动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内外资企业间溢出和反馈效应上,外资企业间乘数效应影响很小。与境内GVC关系效应不同,跨境GVC关系效应促使中国就业增长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研究期间,跨境GVC关系效应促使制造业就业增加了2829万人,大于服务业的2774万人和农业的2252万人。但是,跨境GVC关系效应对制造业就业增加贡献的行业集中度较低,其中,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品业(297万人)和机械设备业(161万人)对跨境GVC关系效应促进制造业就业增加的贡献度仅为16.2%。

表8 2005—2016年关系型GVC与中国分行业就业变动 单位:百万人

| GVC效应      | 农业    | 采矿业   | 制造业  |      |       | 服务业   |       |       | 合计     |
|------------|-------|-------|------|------|-------|-------|-------|-------|--------|
|            |       |       | S13  | S15  | 综合    | S21   | S29   | 综合    |        |
| 境内GVC关系效应  | 11.26 | 0.01  | 1.37 | 0.31 | 8.11  | 12.76 | 1.77  | 17.26 | 36.64  |
| 外资企业间乘数效应  | -0.03 | 0.00  | 0.10 | 0.00 | 0.09  | 0.03  | -0.03 | -0.08 | -0.02  |
| 内外资企业间溢出效应 | 5.28  | 0.07  | 0.91 | 0.20 | 4.57  | 7.52  | 0.57  | 9.43  | 19.35  |
| 内外资企业间反馈效应 | 6.01  | -0.06 | 0.36 | 0.10 | 3.46  | 5.20  | 1.23  | 7.90  | 17.31  |
| 跨境GVC关系效应  | 22.52 | 1.09  | 2.97 | 1.61 | 28.29 | 14.15 | 3.85  | 27.74 | 79.65  |
| 国内外企业间溢出效应 | 22.23 | 1.14  | 2.92 | 1.59 | 27.92 | 13.96 | 3.76  | 27.36 | 78.65  |
| 国内外企业间反馈效应 | 0.28  | -0.05 | 0.05 | 0.03 | 0.37  | 0.19  | 0.09  | 0.39  | 0.99   |
| 总变动        | 33.78 | 1.10  | 4.34 | 1.92 | 36.41 | 26.90 | 5.62  | 45.00 | 116.29 |

注:不同于表6和表7,为了同时进行横向和纵向对比,这里没有以百分比形式呈现;表中数字为各因素变化引致对应行业就业量变动

## 五、结论与讨论

### 1. 研究结论

现有关于GVC就业核算的文献忽略了参与GVC企业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借助于区分内外资企业的ICIO表,将异质性企业间互动关系纳入就业核算模型,提供了一个识别和衡量关系型GVC就业效应的尝试和见解。主要的发现有:第一,关系型GVC在吸纳带动中国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样本期内,关系型GVC就业占中国总就业的比重为16.21%~18.67%。其中,与外资企业相关的境内GVC就业逐渐成为关系型GVC就业的主体,在2008年以后超过跨境GVC就业。且从趋势上看,境内GVC就业占比在上升,跨境GVC就业占比在下降,境内GVC活动在拉动中国就业方面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行业分析发现,制造业境内GVC就业小于跨境GVC就业,而服务业境内GVC就业高于跨境GVC就业。第二,境内GVC关系效应和本国最终产品需求效应是中国实现“稳就业”政策目标的关键,两者保证了中国就业增长的“基本盘”。以金融危机为转折点,本国最终产品需求效应对中国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减弱,而境内GVC关系效应对中国就业增长的影响

在加大,其中的内外资企业间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是积极贡献者。第三,劳动投入强度效应是抑制中国劳动力就业增长的主要因素,最终产品需求效应是促使就业增长的关键因素,内资企业间乘数效应和关系型GVC效应则是影响中国就业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一结论在行业层面也具有稳健性。进一步,跨境GVC关系效应促使中国就业增长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而境内GVC关系效应促使中国就业增长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且以批发零售贸易业和其他商务服务业两个行业最为明显。

## 2. 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对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就业问题的认识,也为政府实现“稳就业”目标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第一,聚焦关系型GVC就业,发挥关系型GVC在促进就业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生产分散化和投资全球化背景下,对一国参与GVC就业效应的解读需要立足于以跨国企业为主导的关系型GVC分析视角的基础上。鉴于关系型全球价值链活动尤其是其中的境内GVC关系在政府实现“稳就业”政策目标中发挥的作用。一方面,在制定就业政策时必须清楚认识到境内GVC就业和跨境GVC就业的结构和行业差异,避免对中国参与GVC的产业政策 and 就业政策产生误判;另一方面,要以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契机,发挥关系型全球价值链活动在促进就业增长中的重要作用。针对性的措施包括:减少企业间互动过程中的制度障碍,降低参与关系型全球价值链的交易成本;对标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需求,推动与外资企业相关的企业间循环的高效畅通以及境内GVC关系的规模拓展;持续巩固跨境GVC关系,挖掘新的贸易增长点,比如加强同RCEP成员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经贸合作。

第二,以“稳外资”助推“稳就业”,增强内外资企业间互动关系“黏性”。本文的结论为2024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的相关举措提供了实证依据。现阶段,我国引进外资尚未达到“天花板”效应的拐点(张鹏杨和唐宜红,2018)<sup>[52]</sup>。作为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外资企业相关的企业间互动关系为中国就业增长作出了独特且重要的贡献。鉴于此,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外资政策,鼓励外商投资,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产权保护和财税支持力度,更大力度吸引外资。在发挥好内资企业间就业乘数主体作用的同时,加大对与外资相关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稳岗扩岗支持力度,大力拓宽就业渠道,以“稳外资”助推“稳就业”。另一方面,加强内外资企业在国内价值链上的互动合作,促进全球价值链在国内部分的延伸,增强内外资企业间的互动关系“黏性”,最大限度地为存量要素跨企业所有制、跨产业的优化再配置创造出高效的制度环境,提升国内大循环质量和效益。这不仅是发挥内外资企业互动关系“稳就业”作用的关键,也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对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深远意义。此外,要警惕外资撤离可能带来的就业风险,尤其是服务业,因为一旦发生外资撤离,通过内外资企业间的互动关系将会加大中国就业市场的波动。

第三,释放经济增长国内需求潜力,激活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动力源”。虽然以金融危机为转折点,本国最终产品需求效应对中国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减弱,但本国最终产品需求效应依旧是促进中国就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且保证了中国就业稳定的“基本盘”。重视内需,尤其是对内资企业的最终产品需求是实现“稳就业”政策目标,增强经济发展韧性的客观要求。在面临不稳定不确定外部环境时,要将发展的战略基点放在自己身上,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释放经济增长的国内需求潜力,将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现实就业红利,进一步稳定和扩大就业。

### 3. 研究局限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还有一些局限性:一方面,本文的研究严格依赖 AMNE-ICIO 表,由于该数据库只提供部门内部区分内外资企业所有权的信息,无法衡量其他类型企业更详细的信息。例如,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大中小规模企业间的互动关系对就业影响如何?显然,如果能够将分类更细的异质性企业活动纳入分析范畴,无疑会加深对于关系型 GVC 就业效应的理解。另一方面,囿于数据的缺乏,本文无法确认跨国企业子公司的投资来源地。鉴于关系型全球价值链本身的特点,任何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都可能影响到跨国企业母国在东道国的投资,并对一国就业产生冲击。

### 参考文献

- [1] 张志明,代鹏,崔日明.中国增加值出口贸易的就业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北京: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5):103-121.
- [2] 李磊,盛斌,刘斌.全球价值链参与对劳动力就业及其结构的影响[J].北京:国际贸易问题,2017,(7):27-37.
- [3] 赵玉焕,史巧玲,尹斯祺,姚海棠.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测度及对就业的影响研究[J].北京: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2):13-26.
- [4] Antràs, P., and D.Chor.Global Value Chains[J].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2, 5, (1):297-376.
- [5] Antràs, P.Conceptual Aspects of Global Value Chains[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20, 34, (3):551-574.
- [6] Allen, T.Information Frictions in Trade[J].Econometrica, 2014, 82, (6):2041-2083.
- [7] 祝坤福,余心珂,魏尚进,王直.全球价值链中跨国公司活动测度及其增加值溯源[J].北京:经济研究,2022,(3):136-154.
- [8] Koopman, R., Z.Wang, and S.J.Wei.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 (2):459-94.
- [9] 王直,魏尚进,祝坤福.总贸易核算法: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5,(9):108-127; 205-206.
- [10] Xiao, H., B.Meng, J.Ye, and S.Li.Are Global Value Chains Truly Global?[J].Economic Systems Research, 2020, 32, (4):540-564.
- [11] Wang, Z., S.J.Wei, X.Yu, and K.Zhu.Global Value Chains over Business Cycl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22, 126, (9):102643.
- [12] Cadestin, C., K. D.Backer, I.Desnoyers-James, S.Miroudot, D.Rigo, and M.Ye.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The OECD Analytical AMNE Database[R].OECD Trade Policy Papers, 2018, No.211.
- [13] Miller, R.E., and P.D.Blair.Input-output Analysis: Foundations and Extension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14] 张友国.中国三大地域间供需双向溢出-反馈效应研究[J].北京: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5):3-19.
- [15] 刘瑞翔,颜银根,范金.全球空间关联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增长[J].北京:经济研究,2017,(5):89-102.
- [16] 谢锐,陈湘杰,张友国.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贸易双向溢出效应研究[J].北京:统计研究,2020,(1):88-98.
- [17] Wang, L., B.Zhang, and J.Ye.Multiplier, Spillover and Feedback Effects of Employment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Skills and Sector-based Perspective[J].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2024, 69, (8):2555-2579.
- [18] 侯俊军,岳有福,叶家柏.供需双循环测度与中国经济平稳增长[J].北京:统计研究,2023,(3):3-17.
- [19] 卫瑞,张文城.中国外需隐含国内就业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北京:统计研究,2015,(6):42-49.
- [20] 葛阳琴,谢建国.需求变化与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基于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实证分析[J].北京:经济学(季刊),2019,(4):1419-1442.
- [21] 谢锐,牛猛,张斌.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就业变动及驱动因素研究[J].北京:中国管理科学,2023,(5):49-59.
- [22] Gereffi, G., J.Humphrey, and T.Sturgeon.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5, 12, (1):78-104.
- [23] Antràs, P., and D.Chor.Organizi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J].Econometrica, 2013, 81, (6):2127-2204.
- [24] Grossman, G., and E.Helpman.Outsourcing in a Global Economy[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5, 72, (1):135-159.
- [25] Timmer, M.P., S.Miroudot, and G.J.de Vries.Functional Specialisation in Trade[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19, (1):1-30.

- [26] Baker, G., R.Gibbons, and K.J.Murphy.Relational Contract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117, (1): 39-84.
- [27] Epede, M.B., and D.Wang.Global Value Chain Linkages: An Integrative Review of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SM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22, 31, (5), 101993.
- [28] Lakhani, T., S.Kuruvilla, and A.Avgar.From the Firm to the Network: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 Theory [J].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13, 51, (3): 440-472.
- [29] Wang, Z., S.J.Wei, X.Yu, and K.Zhu.Tracing Value Added in the Presenc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R].NBER Working Papers, 2021, No.w29335.
- [30]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Trading for Development in the Ag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R].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20.
- [31] 刘灿雷,康茂楠,邱立成.外资进入与内资企业利润率: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J].北京:世界经济,2018,(11):98-120.
- [32] 毛其淋,方森辉.外资进入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生产率[J].北京:世界经济,2020,(1):143-169.
- [33] 张婷,高德婷,蔡熙乾,谢申祥.以“稳外资”助推“稳就业”[J].北京:财贸经济,2021,(6):104-118.
- [34] 陈勇兵,胡佳雯,杜雨蕊,占超群.外资进入促进了就业净增长——来自中国外资准入限制放宽的证据[J].北京:经济学(季刊),2024,(3):793-809.
- [35] 包群,叶宇华,王艳灵.外资竞争、产业关联与中国本土企业的市场存活[J].北京:经济研究,2015,(7):102-115.
- [36] 金京,戴翔,张二震.全球要素分工背景下的中国产业转型升级[J].北京:中国工业经济,2013,(11):57-69.
- [37] 许和连,魏颖琦,赖明勇,王晨刚.外商直接投资的后向链接溢出效应研究[J]北京:管理世界,2007,(4):24-31,39.
- [38] 葛顺奇,李川川,林乐.外资退出与中国价值链关联:基于外资来源地的研究[J].北京:世界经济,2021,(8):179-202.
- [39] 侯俊军,岳有福,叶家柏,孙克娟.供需循环实现稳就业的双重保障效应分析[J].北京:财贸经济,2024,(5):142-158.
- [40] Dietzenbacher, E., and B.Los.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Techniques: Sense and Sensitivity[J].Economic Systems Research, 1998, 10, (4): 307-323.
- [41] Horvát P., C.Webb, and N.Yamano.Measuring Employment in Global Value Chains [R].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Working Papers, 2020, No.2020/01.
- [42] 田开兰,孔亦舒,高翔,杨翠红.供给侧中国非农就业变动及驱动因素分析[J].北京: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8,(5): 1132-1140.
- [43] 张俊荣,田开兰,张瑜,杨翠红.基于企业规模异质性的中国内外循环就业效应及影响因素探究[J].北京: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2,(12):3151-3164.
- [44] 毛日昇.出口、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就业[J].北京:经济研究,2009,(11):105-117.
- [45] 韩民春,张丽娜.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撤离对中国就业的影响[J].北京:人口与经济,2014,(5):87-94.
- [46] Meng, B., Y.Gao, J.Ye, M.Zhang, and Y.Xing.Trade in Factor Income and the US-China Trade Balance[J].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2, 73, (6), 101792.
- [47] 黄群慧,倪红福.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测度分析——兼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J].北京:管理世界,2021,(12): 40-58.
- [48] Antràs, P., T.C.Fort, and F.Tintelnot.The Margins of Global Sourcing: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US Firms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7, 107, (9): 2514-2564.
- [49] 张鹏,张平,袁富华.中国就业系统的演进、摩擦与转型——劳动力市场微观实证与体制分析[J].北京:经济研究,2019,(12):4-20.
- [50] 蔡昉.中国经济改革效应分析——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视角[J].北京:经济研究,2017,(7):4-17.
- [51] Solingen, E., B.Meng, and A.Xu.Rising Risks to Global Value Chains[R].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21: Beyond Production, 2021.
- [52] 张鹏杨,唐宜红.FDI如何提高我国出口企业国内附加值? ——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视角[J].北京: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7):79-96.

## Research on the Employment Effects of Relational Global Value Chains in China

YUE You-fu<sup>1,2</sup>, HOU Jun-jun<sup>1,2</sup>, YE Jia-bai<sup>3</sup>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Changsha, Hunan, 410205, 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79, China;

3.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If employment is stable, then the foundation is solid, and the country is peaceful. Understanding the employment impact of relational global value chain (GVC) activities, which arise from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enterprises, is of significant reference value for governments aiming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tabilizing employment” by maintaining stable market entities. To this end, based on the inter-firm spillover-feedback effect model and 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domestic GVC and cross-border GVC relationships, this paper measures and analyzes the employment effects of relational GVCs in China. Additionally, through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it explor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employment changes in China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al GVCs.

The study finds that domestic GVC employment exceeds cross-border GVC employment in China after 2008, and the share of domestic GVC employment in total employment is rising, a feature that i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service sector. It is crucial to note that overlooking the employment creation generated by domestic GVC activities related to foreign-owned enterprises will lead to misjudgment of employment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The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omestic GVC relationship effect and the domestic final product demand effect play a key role in the stable growth of employment in China, and both ensure the “fundamentals” of China’s employment growth. Tak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as a turning point,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domestic GVC relationship effect to China’s employment growth is increasing. Among them, spillover and feedback effects between domestic-owned and foreign-owned enterpris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The industr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omestic GVC relationship effect contributes to China’s employment growth mainly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is most concentrated in two sectors: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repair of motor vehicles”, and “other business services”.

This paper makes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 Firstly, it provides an attempt to identify and measure the employment effects of relational GVCs, enrich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employment issues in China within the context of GVCs; Secondly, it distinguishes between the employment effects of domestic and cross-border GVC relationships, which is not covered by traditional accounting frameworks that only consider cross-border GVC employment; Thirdly, i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goal of “stabilizing employment” and serves as a valuable supplement and expansion to the existing body of research.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employment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GVCs and provides useful policy insights for the governmen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tabilizing employment. Firstly, focusing on relational GVC employment and the important role of relational GVCs in promoting employment growth; Secondly, promoting “stabilizing employment” through “stabilizi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nhancing the “stickiness”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mestic-owned and foreign-owned enterprises; Finally, unleashing the potential of domestic demand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activating the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and full employment.

**Key Words:** relational global value chains; spillover feedback model; domestic global value chain employment;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employment growth

**JEL Classification:** C67, D57, J21

**DOI:** 10.19616/j.cnki.bmj.2025.04.004

(责任编辑: 闫 梅)